

[日]山川早水著
李密 李春德 李杰 译
蓝勇 审定

巴蜀旧影

一百年前

一个日本人

眼中的巴蜀风情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日〕山川早水著
李密 李春德 李杰 译
蓝勇 审定

旧影 巴蜀

——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
眼中的巴蜀风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旧影——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 / [日]山川早水著；
李密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20-06890-5

I. 巴… II. ①山… ②李… III. 游记—作品集—
日本—近代 IV. I3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4068 号

BASHU JIUYING

巴蜀旧影

——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

[日]山川早水 著

李密 李春德 李杰 译

蓝勇 审定

责任编辑	谢 雪
责任校对	叶 勇
封面设计	任兆祥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cn http://www.scrmcb.com E-mail: scrmcb@mai.l.sc.cninfo.net 电话:(028)86661236 86650010 (028)86679239
防盗版举报电话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制 作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880mm×1230mm 1/32
开 本	9
印 张	200 千
字 数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1—3000 册
印 数	ISBN 7-220-06890-5/K · 1009
书 号	25.00 元
定 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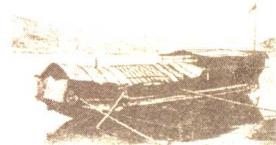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028-84122206)

山川早水著

巴蜀

東京成文館



中译本序言

清末随着开埠通商，一大批西方人进入深处内陆的四川考察，从西方人的角度开始观察深处内陆的巴蜀社会，已经翻译出来的有英国人丁格尔《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英国人立德乐《扁舟过三峡》、英国人莫里循《中国风情》、法国人多隆《彝藏禁区行》、英国人阿绮波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1]，没有翻译过来的关于四川的游记还有许多^[2]。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人对中国内陆的了解，往往并不深入和全面。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在地理位置上又得天独厚，往来中国较为方便，故清末以来，日本对中国内陆的了解欲望一直很强，元代雪村就到四川进行过考察，并留有记载。

但近代日本囿于明治维新前的闭关政策，对中国的考察落后于西方国家，只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略中国战略的影响下，才开始像西方人一样进行考察。清代最早在四川考察的日本人是竹添进二郎，他在明治九年（1876年）对四川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写下了《栈云峡雨日记》，对清后期四川





的民风民情作了较多记载。随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安东不二郎写有《中国漫游实记》，也对四川有记载。

以上的游记相对于后来的《巴蜀》一书来看，考察时间较为仓促，多流于表面，总体来看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特别是对内陆地区的了解并不如西方人。不过，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日本人山川早水对中国四川进行了一次长达四个月的旅行，撰写了二十多万字并配有一百五十多幅照片的四川游记——《巴蜀》，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由日本东京成文馆出版，将日本人对四川的了解引入了高潮。现在看来，这部《巴蜀》不仅是清末国外最详细的四川游记，也是国内最详细的四川游记。遗憾的是《巴蜀》一书在国内典藏甚少，目前不见流传，国内学者知之甚少，不仅不见引用，更谈不上对它的研究。

《巴蜀》作者山川早水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日文教师。《巴蜀》一书为作者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三至七月在四川境内的考察日记。他从宜昌开始，历经三峡归州、巴东入四川的巫山、夔州、云阳、万县、梁山、大竹、顺庆、蓬溪到成都，再经眉州、嘉定府、峨眉到峨眉山，再从眉州、青神、双流到成都，再从眉州、嘉定府、犍为到叙州府经南溪、江安、纳溪、泸州、合江、江津到重庆，最后经长寿、涪州、丰都、忠州、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入湖北巴东、归州到宜昌。对沿途的民生状态、风情风物、历史古迹、政治制度作了十分详细的记载。另外结合当时中外游人的游记，对成都到打箭

炉行程和成都经新都、德阳、罗江、绵阳、梓潼、剑州、昭化到广元的行程和郫县、新繁、灌县、彭县、新都、自流井都作了记载。

现在看来，这部二十多万字的记述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一百多年前四川的社会风情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内容丰富翔实，重点突出

清代关于长江上游的游记并不少，仅《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的关于四川的游记就有《蜀道驿程记》《夔行纪程》《游蜀日记》(吴焘)、《康游日记》《雅州道中小记》《蜀游日记》《游蜀日记》(黄勤业)、《使蜀日记》等。这些游记从总体上来看，文字相对较少，最长的也仅万字，记载相对较简略。同时，对沿途的风物和古迹的记载一般较详实，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民生状态少有涉及。清代末年记载四川社会风情的书十分多，如《成都通览》《丁绍棠纪行四种》《芙蓉忆旧录》《蜀游闻见录》等，大多由国内文人所撰，虽然各书体例取舍用材不尽相同，但其观察的角度和所受的限制多有相似，即多有隐讳之处。

现在看来，这本二十多万字加上一百五十多幅照片的《巴蜀》一书是目前留传至今关于清代四川最宏大的游记，也是我国民国以前几千年来部头最大的一部关于四川的游记。

其内容的翔实主要体现在：

内容全面，考察深入

《巴蜀》一书虽然是游记，但并不是一本简单的

流水账，不像清代一般的国内游记多以记载沿途古迹名胜为主，而是在记载沿途的地理地势、风土人情、经济和物产状况、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基础上，突出对经济贸易、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的记载。

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十分熟悉，故游记对沿途历史名胜不仅多有记载和感怀，还有一些考证和研究。如在宜昌对荆门、虎牙历史的描述，博采古史，古今融通；作者对南宋范成大的《吴船录》和陆游的《入蜀记》十分熟悉，旅行中经常将七百多年前范成大和陆游记载的风物与当时的风物进行比较；如将陆游记载的黄陵庙卖茶妇人与清代的妇女进行对比，发现妇人肤色并不像陆游记载的那样白，也不见缠有青斑布头巾。有时还对一些史迹进行考证，如在归州对秭归得名及与楚文化和屈原的关系的考证，也是有一定见解的。

关于巫山十二峰，今天普遍认为是六峰在江南，六峰在江北。以前我曾据实地考察和一些文献记载指明宋代以来的十二峰均在江北，只是清末才因编《巫山县乡土志》搞乱了的^[3]。《巴蜀》一书在记载十二峰时也记载十二峰“皆排列于北岸”，也印证了我的考证的正确，反过来说明了《巴蜀》一书作者考察的深入。

对于瞿塘峡的栈道，以往许多学者认为由夔州府知府汪鉴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凿，但据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一〇《职官》记载，最早应为四川参政吴彦华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修建，距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其间的修补情

况并不清楚。据何竹君《白帝城》一书记载从同治至光绪间多有补修，但不见同治以前的修补记载。而《巴蜀》一书专门谈到在道光三年（1823年）由湖北官员李木忠补修这条栈道之事，故对于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巴蜀》关于经济方面的记载十分多，且十分深入。如关于奉节臭盐碛生产状况，前人记载不详，游记较详细记载了开采的情况。其他如记载梁平佛耳岩开采煤窑、梁山县民间造纸、顺庆府土壤肥沃而橘柚众多、峨眉县白蜡生产过程都较为详细。同时，对当时四川民间物价亦留下了许多真实的材料，如租船价、租房价、雇工价，各种食品价（如鱼价、小吃价、米价等）、白蜡价，可与官方统计的物价材料相互比较。

书中还记载了许多近代交通与通讯对四川的影响情况。如记载当时夔州府与万县已经有电话相通，峨眉县邮局的设立状况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打箭炉与成都通电话的情况。书中对川汉铁路作了许多记载，如记载川汉铁路的重要性，认为：“重庆之地，只要三峡不改造，只要川汉铁路不开通，我相信，日本商人乃至外国商人之事业进步甚难。”其对于川汉铁路的集资状况也有记载，甚至记载了在石宝寨附近两艘运川汉铁路铁轨的烂船细节。

作者也十分留心观察自然状况，如锦江往时澄澈适合洗锦的记载，金沙江和岷江泾渭分明的记载、叙州府近山产豹而店中多挂金斑皮的记载。



旁征博引，存留他人资料多

游记中不时录入相关的名胜诗词，如在奉节处录入从晋到明代的诗三十多首，在成都处录入唐宋元明诗四十多首，在蜀道处录入唐至清诗四十多首。录入当时四川彭县高小日本教习秩父固太郎关于新都、新繁、灌县、郫县、彭县的记载；又如“参考群书，再加有二三本邦人之实地考察”写出了成都至广元的行程记载。在峨眉山处录入元代日本人雪村《峨眉集》中关于巴蜀风情的记载近万字。书中还转载了秩父固太郎对自流井行程的记载。

重点突出，资料丰富

《巴蜀》一书不像一般的游记对各地如流水账一样的记载，而是在重点地方深入下去考察，重点加以记载，甚至加以考证研究。如在成都、重庆、峨眉山游历后的记载，已经不像一个游记，而成为对成都、重庆、峨眉山的综合记载和研究了。对成都的记载有五万字之多，记载了成都城墙、市街情况，外国商品行情、外国人状况、外国人工厂和学校，蜀人的气质，成都的报刊、书籍、碑帖、古董、古迹，顺记川汉铁路和征巴塘情况，特别对日本人在成都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记载，许多内容都是清末《成都通览》一书所没有或记载不详的，如1902年成都开始有了人力车（自行车）的记载，成都城市清洁居于全国前列，清末成都英法德美等国侨居人数的统计数，特别记载了在成都的日本人的职业分布，连日本人在成都的服饰、居室、食物、交际

习俗、疾病、通讯条件的记载都十分详细。

关于峨眉山的记载有两万多字，记载中旁采古诗旧文，与考察融会贯通，自成一体。

关于重庆的记载有近万字，对在重庆的外国人生存状况作了较多的记载，特别是对日本商人在重庆的情况作了较多的记载，重点对美国人和法国人在重庆开办的医院作了介绍。

二、记载反映了现实社会下层生活状态，弥补了国内游记的不足

清末国内文人对我们自己下层的一些社会风情十分熟悉，反而见惯不惊而疏于记载。山川早水作为日本人，著作又是在日本出版，他的观察角度往往是我们所不具有的，故能对一些社会下层的民生状况作一些记载而无所避讳，这就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社会下层风情的重要史料。

游记对当时长江上游的旅店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载，这是国内同类著述中十分缺乏的。如对宜昌兴隆旅店的记载，细及店内窗户、油灯、饮食、宿费。同时对万县分水岭客栈、嘉定府文昌旅店、夹江县太和旅店的记载都十分详细。

游记对坟墓和棺木的有关记载，如生前置棺无忌嫌的传统和“游在苏州，死在甘肃”的民谚，都是十分准确的。

作者记载了自己多次租船的经历，留下了当时民间租船租金的记载，弥补了同类记载的不足。在行船过程中作者将当时船夫的生活细节详细记载了下来，如怎样用江中水煮饭不会有沙，还有嘉定府



卖货舟、夔州府妓船等。关于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在资料中十分分散，故有一些问题还不很清楚，《巴蜀》书中对红船作了一些记载，特别是记载了红船可随时由商人租用并兼有保安的功用，对于今天研究救生红船的历史十分有用。

作者在途中有许多会友交往，如在宜昌见宜昌小学校长范德明、在夔州府与州府方旭的交往等对我们了解当时中上层官员的应酬礼俗有更深入的了解。

游记中首次披露了沿江民房小饭店中面向过往船夫开设妓院，以满足船夫长期在外性生活方面的需求，总结出“在峡江沿岸不仅只是黄陵庙，据说一聚人家，其中若干必为私窝”。这是国内外唯一关于清代三峡沿江暗娼与船工关系的记载。奉节城的花船（歌妓），十分有特色，在清末民初《丁治棠纪行四种》中就有记载，但并不详明。山川早水本人因亲身消费体验，对其记载十分详细而生动。

关于长江三峡的纤夫拉纤，国内的《夔行纪程》《川船记》《游蜀后记》均有较详细的记载，而立德乐《扁舟过三峡》《中国风情》等书也有记载。但山川早水的记载更为生动具体，如记载：“陆地上有五六十人近乎是爬行着拉纤。船上有一个像老板模样的人，在他嘶哑的厉声命令下，所有水手全部排成一排划桨……纤夫也会一个压倒一个地摔倒，摔个鼻青脸肿……”

对于清末社会残破、经济凋敝而乞丐遍野的状况也多有记载，如记载大竹县“饥饿的人横于途中，有死者，有将要死者，有伸手向行人乞讨者，如此场面约有三四起”。记载眉州城内“女丐尸体横于路旁，口

鼻生蛆，秽臭袭人”。

中国古代自来有旌表前贤的传统，从《华阳国志》的记载来看早在汉晋时期四川就特别盛行。对于清代流行于四川民间的《德政碑》，早在竹添进二郎《栈云峡雨日记》中就有记载，但其信之不疑。但《巴蜀》记载：“听说此种碑实际上是前任为了统治人民而自己建造的，不知是否果真如此。”这种记载，无疑对于我们真正了解清末社会是有帮助的。

清代末年，重庆、万县等地先后开为商埠，外国商人可以开商店，但清末成都并没有开埠，外国商人的商店也十分多，其秘密何在呢？《巴蜀》记载：“成都乃非开港地，外商不得公开营业。前记之诸店，皆借中国人之名义。”这种现象与今天的一些类似经济现象又何等相似！《巴蜀》一书中还记载了成都青羊宫附近小饭店男女分棚饮食的习俗，这风俗可能在当时并不异常，国内并不见记载。

山川早水到四川的1904年，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夕，山川早水记载：“革命思想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尚未听到有作为首倡天下者。广东、湖南等地方无论怎样骚动，似乎尚未特别引起蜀人之波动，蜀之富饶使他们满足于他们现有的生活。蜀人的智慧告诉他们，提倡达不到目的之革命，或者附和之，皆不为当务之急。哥老会在日本人当中是作为小说之事来传播的，可是在本国却不怎么传播，官民皆置之不理，其信徒虽然在四川也是散居成都以及各个地方，但都是一些乌合之众。至于有什么野心，在思想界中亦无所谓轻重可言。”这则史料对于我们分析当时社会对革命的态度自然是十分



有用的。

三、大量清代末年的长江上游社会风情照片， 成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当时社会景观不可多得的第一 手材料

清末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后，多在上层作为人像摄影用，将摄影镜头对准当时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情的十分少，而外国人在这方面则最为有条件。《巴蜀》一书中一百五十多幅黑白照片，印刷较为精良，内容十分丰富。如清末宜昌码头照片，以往西方人的摄影多是远景，《巴蜀》所附宜昌码头的近景照片，为我们研究宜昌码头历史提供了直观材料（包括搬运工、船型、建筑等）。《巴蜀》一书有大量川江船的照片，有一些屋船与宋代夏圭《长江万里图》中的船十分相似，而与我们近五十年看到的船型相差十分远。再如嘉陵江上的翘尾船，与近五十年的船差别较大。《巴蜀》中的救生红船照片是我国最早的救生红船照片，为我们直观了解当时的救生船留下了宝贵的图像资料。其他如平善坝税关、黄陵庙、三峡中死尸、上百人拉纤、臭盐碛煮盐、保宁府城门与城墙、顺庆府城墙、成都皇城和古较场、成都文殊院僧人、成都锦江生态、成都万里桥与河道、自流井盐厂、重庆朝天门门楼、英国水兵俱乐部、清代长寿县、石宝寨、三游洞等照片都十分珍贵。另其保留的和田氏的《剑门关》《朝天阁》照片是我国最早的剑门关照片，其中广元朝天关照片是国内外唯一张朝天关照片。这两张照片都被民国时神田正雄编的《四川省综览》所沿用。

山川早水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赶超西方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时期，故游记中难免不打上经济文化渗透和侵略的烙印。

如在宜昌时记载：“走进西洋杂货店看一看，商品大部分为德、法品，英、美次之。其价格，某些种类亦比我国低廉。我国的商品有福神酱菜、卷纸、洋伞、座钟，共计不过数种。余本无资格论及商务。但看着眼前陈列的商品以西洋产品居多，对此不能不感到羞愧。来到书店，新译书之多令人吃惊，且使人高兴的是有九成属我们国家的各种科学书。此等译书大抵出自东京留学生之手笔，在上海出版。纵令有乱译误译的，但各书店亦认之。至于西洋书籍几乎只影无存，焉能心中不快。余在杂货店皱起眉头，在这些书林面前舒展开了。”

《巴蜀》一书中对商业贸易的关注十分明显，如在记载成都的商务时，详细分析了外国商品的优劣，如分析德国商品在成都市场影响大的三个原因，并具体分析了德国人的精明之处，再分析了日本商人的不足，提出主要是日本人“思之不精，行之不实”。看着英法德诸国侨民有永久定居计划而有实现某种计划的趋势，他为日本人普遍屈指归期感到着急！特别是在嘉定府看到英国军船停泊其地，感叹“回顾我日本又如何？竟未能往重庆派遣一艘军船……国力之不及亦是遗憾之事”。

但同时山川早水本人对中国人的勤奋和勇敢也是十分敬佩的。如在空令峡看见悬崖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开路民工，才只有四五百文工酬，感叹“中国的劳工实可敬畏”。

《巴蜀》一书出版后，在日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此以后，日本个人游历考察四川的高潮兴起，如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中野狐山《中国大陆横断游蜀杂俎》（大正二年，1913年）、上冢司《以扬子江为中心》（大正十四年，1925年）、高山庆一《长江漫游日记》（大正十五年，1926年）、神田正雄《从上海到巴蜀》（昭和十年，1935年）、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昭和十一年，1936年）等。其中《四川省综览》中的一些照片和绘图是从《巴蜀》一书中采下的。同时，一些团体对四川的考察也大规模展开，如东亚同文书院、日本一些实业协会都组织对四川作了大量考察，留下了许多当时四川风情的记载，如《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中国开港场志》《中部中国经济调查》等都有许多四川考察的资料。日本人从此在对四川的了解方面与西方人相比开始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

从近代四川区域史的研究来看，在20世纪初国内自己还没有一本游记能如此细致和没有顾忌地记载当时四川社会的真实风情，如关于旌表前贤的德政坊内幕、峡江民妓、官场应酬，都是国内文献少有记载的，特别是许多当时的照片，是当时国内游记完全不具备的，这些照片就成为我们感性地了解当时四川社会风情的十分宝贵的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蜀》一书是我们研究清末民初四川社会风情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

同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一百多年前的巴蜀景观风情描述，特别是一百多幅十分难得的景观风

情照片，对于热爱历史、热爱乡土、热爱旅游的人来说也是一本难得的读物。对于我们今天的旅游者来说，如果能将此书带上，循着前人的步伐，感受历史的脚步，面对岁月的沧桑，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巴蜀》一书是2002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书库中偶然发现的，之前虽然有一位老师借阅过，但并没引起重视，而目前国内还没有见哪里再有收藏，国内学者论著中也没有提及，故引发翻译和研究这本书的想法。有赖于我校外国语学院李密老师等对翻译此书很有热情，使这本书能很快与读者见面。翻译过程中，万克民先生、蒋安敏女士对翻译工作支持很大，在此表示感谢。我对其中一些涉及历史文化、地理风物的问题作了一些校正，对一些价值不大的诗文、碑刻作了删节。

蓝 勇

2004年9月14日于重庆北碚

注 释

[1] 丁格尔：《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陈曾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立德乐：《扁舟过三峡》，黄立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多隆：《彝藏禁区行》，辛玉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阿绮波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2] 王晓伦：《近代西方在中国东半部的地理探险及主要游记》，《人文地理》2001年第1期。

[3] 蓝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考证三则》，《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4] 丁治棠：《丁治棠纪行四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